

中国生命智慧

《易经》《道德经》《坛经》心证



郭照第 著



人民出版社



中国生命智慧
《易经》《道德经》《坛经》心证

ISBN 978-7-01-009648-3



9 787010 096483 >

定价：46.00元

郭昭第 著

中国生命智慧
《易经》
《道德经》
《坛经》心证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之美

版式设计:四色土图文设计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生命智慧:《易经》、《道德经》、《坛经》心证/郭昭第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

ISBN 978-7-01-009648-3

I. ①中… II. ①郭… III. ①周易-研究②老子-研究③坛经-研究

IV. ①B221.5②B223.15③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5769 号

中国生命智慧:《易经》、《道德经》、《坛经》心证

ZHONGGUO SHENGMING ZHIHUI:《YIJING》、《DAODEJING》、《TANJING》XINZHENG

郭昭第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凌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25

字数:370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01-009648-3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录

1 / 绪论

17 / 第一章 《易经》及其生命智慧

17 / 第一节 《易经》：中国生命智慧的原始经典

34 / 第二节 《易经》生命智慧阐释



133 / 第二章 《道德经》及其生命智慧

133 / 第一节 《道德经》：中国生命智慧之反智论经典

157 / 第二节 《道德经》生命智慧阐释

绪 论

虽然近年来人们在使用“经典”这个概念时存在着降低水准、甚至无节制贬值的现象,但真正意义的经典应该是至高无上的,是一个民族最高生命智慧的结晶,是整个民族对人类的最伟大、最突出贡献的集中体现形式。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人们特定年代所形成的圣典崇拜心理之外,主要还是因为经典本身具有开启后人生命智慧的独特作用,具有非常突出的全民性与永久性,能够长久地甚至数千年地影响某一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思维习惯与生活方式。经典作为某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生命智慧的最高体现形式,应该受到人们的长期尊崇,应该成为永远地尊崇的典范与践行的指南。

一、重视中国生命智慧经典的意义

西方社会虽然也发生过政治乃至文化革命,但往往只是实行政教分离,并没有取缔宗教在教化人心、提供精神支柱方面的功能,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乃至否定经典的价值与作用。虽然 20 世纪的解构主义也曾经出现过否定传统的思潮,但充其量只是一种思想界的思想革命,并未得到全社会尤其政治的推波助澜,乃至成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而且诸如芝加哥大学等开设有“伟大的经典”课程,有些西方教育家甚至将讲授经典的课程称为永恒课程,将开设永恒课程的教育称为永恒教育。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五四运动得到了政治的支持,在较长历史阶段成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乃至影响了普通民众的思维习惯与生活方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经验和教训。其实行政治革命乃至逐渐取缔儒家甚至传统文化在教化人心、提供精神支柱方面的主要作用的做法,并非无缘无故的,

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某些必然性。我们应该看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较量是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第一阶段是明末传教士东来到鸦片战争爆发,这一阶段是真正的文化交流时期;第二阶段是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这一阶段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于是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念,但洋务运动的失败最终使他们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优点并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更在于政治制度,但辛亥革命的失败又一次教训了中国人,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并不仅仅在于政治制度,乃在于整个中国文化,于是产生了全盘西化的思想,历史就进入第三阶段。但全盘西化观念的横行无阻,并没有像五四精英们所想象的那样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面貌,倒是中国早有的重视自我道德修养,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伟大民族传统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于是历史才有可能进入第四阶段,使我们在经历了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的偏颇之后,有信心完成中西文化的真正的有生命融合的阶段。因为对西方文化的学习,需要一种自主自立的思想气度,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的意愿和一种敢于正视人类存在深层意义的勇气,而这正是五四以来的许多知识分子所缺乏的。

欲亡一国之民,必先亡一国之文化。近代中国的真正悲剧不仅在于经济的落后,更在于民族自尊的缺失。现代中国的这一问题归根结底开始于五四精英们错误地将国家的落后归罪于文化的落后。余英时指出:五四运动的错误在于,“未能建立起接受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未能了解文化的再造不在形式而在精神,不在躯壳而在生命,并且它所提出的‘全盘西化’的偏激口号也因过于损伤民族自尊心无法为一般人所接受。五四运动为什么有这样的错误呢?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太忽略对自己的了解”。^①20世纪中国文化的构成基本上是由东洋派、西洋派和本土派构成的。其中东洋派以鲁迅、郭沫若等为代表,主要是留学日本,在日本间接地感知了一些西洋文明的印象,并不真正了解西洋文明实质,也没有十分透彻地把握中国最高生命智慧,甚至并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代表中国生命最高智慧的经典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构成。这批知识分子虽然一生的文化修养甚至思维定

^① 余英时:《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与检讨》,《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156页。

式受制于中国文化精神,却自始至终不承认中国文化的价值。西洋派,以胡适为代表,主要是一些留学欧美国家直接而且真切了解了西洋文明真实状况的知识分子构成,这批知识分子虽然青年时代极力张扬西洋文明,甚至极端地批判了中国文明乃至东方文明,但中年乃至晚年基本上走向了其反面,由中国文明的反对者转而成为中国文明的研究者、张扬者,其中如方东美等可能转变得较快,他们往往以后来的实际行动纠正了青年时代的片面与浅薄。本土派以熊十力、梁漱溟等为代表,他们虽然没有走出国门,却总是喜欢将中国文明放在世界文明的大背景中去观照和透视,每每能够发现中国文化精神,而且从来没有丧失过自信。其中为数不多的学者如马一浮,既留学过日本、欧美国家,同时又对中国乃至东方文明十分精通,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上述所有派别的片面与偏激,而且以融会贯通中国乃至世界文明而显示出绝无仅有的魄力与气度,属于中国文明的真正脊梁。纵观 20 世纪中国文明的最高成就,虽然本土派与融合派在整个 20 世纪甚为寂寞,但贡献最大。遗憾的是中国历史却错误选择了西洋派尤其是东洋派,而忽略了本土派和融合派。近年来兴起的国学热不仅是对西洋派尤其东洋派反传统思想的一次反动,而且也是对本土派、融合派以及部分西洋派张扬中国文明所形成的所谓新儒学的一种肯定。尽管当前国内一些大学也开设了国学经典的课程,但还是有人对此持有疑虑。

国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生命智慧的最高结晶,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扎实根基,是几千年来维护我们民族屡经劫难而生生不息的强大纽带。阅读这些经典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能帮助我们建立做学问的基础,更在于能达到修身养性、体悟生命智慧的目的。包括儒释道经典在内的所有国学经典,应该说都是历代圣贤生命智慧的结晶,只是由于体悟的角度、着眼点乃至层次的不同而显示出差异,如《金刚经》^①有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金刚经·无德无说分第七》)国学经典历来被归纳为经、史、子、集四大类,但应该是没有明确界限的。经,过去也许只是指儒家《易经》,乃至后来所谓十三经,但我们可以将其扩展为包括儒家、道家、佛教之最具权威性的经典,如儒家的《易经》、道家的《道德经》、佛教的

① 《金刚经》,河北禅学研究所:《禅宗七经》,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6 年版。

《坛经》等；子，过去主要指儒家十三经之外的诸子典籍，我们现代可以将儒释道经典之外其他著作如《庄子》、《韩非子》、《墨子》，乃至所有《诸子集成》等都作为这类；史，主要指历史典籍，如《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乃至所有“二十五史”等；集，主要个人别集、总集等，别集如《韩愈集》，总集如《全唐诗》等。无论如何归类，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所有这些国学经典，其实都是蕴涵着丰富的生命智慧的，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乃至生命精神的载体。

但是在浩如烟海的国学经典之中，一定要选择三两部终生读之而不为浪费时间，每次阅读总有所获，且每每超越知识局限，不仅仅对获得诸如学历、学位、职称、职位，乃至职业有用，更对人生乃至生命有醍醐灌顶作用的生命智慧经典，在我们看来，《易经》、《道德经》和《坛经》这三部经典即具有这样的作用。不仅仅因为这三部经典已经完全超越了烦琐的知识细节、具有了生命智慧经典的性质，而且在于这三部经典最能代表、最能体现作为中华民族最高生命智慧的儒释道三家的最高生命智慧。这三部经典作为中国儒家、道家、佛教文化最高生命智慧的体现，各有独特的生命精神：其中《易经》虽然并不直接彰显生命智慧的价值与意义，但经的部分每一卦辞都蕴涵着丰富的生命智慧，是古代智者生命智慧的结晶；《道德经》虽然明确反对智慧，但它所反对的严格来说主要是巧智、机巧乃至小智慧，而并不一概反对真正明白四达的生命大智慧，整部《道德经》可以说是对真正生命大智慧的精辟阐述。至于《坛经》，作为国人创造的唯一一部以经来命名的佛教著作，更是将生命大智慧作为核心命题，将明心见性作为证悟生命大智慧的根本途径，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透彻睿智。再者三部经典也确实体现了儒家、道家和佛教文化各自的生命精神，且恰到好处地形成了优势互补的完整体系。如果说儒家崇尚自强不息、刚健笃实的进取精神，道家则主要强调了清静无为、无执无争的柔让精神，佛教则主要重视明心见性、自悟成佛的超越精神。如果儒家主要是积极入世，佛教主要是积极出世的话，道家则不入不出。如果真正的生命大智慧平等不二、不取不舍、通达无碍，那么，对儒家、道家、佛教生命智慧不取不舍、无执无碍，才是对生命大智慧最为通达无滞的体悟和最为炉火纯青的运用。

在这三部生命智慧经典之中，也许有些人会怀疑《易经》仅仅是一部占

卜书、《坛经》仅仅是一部宗教著作，甚至有宣扬封建迷信的嫌疑。这其实是对两部生命智慧经典的最大误解。《易经》是中国生命智慧经典之中最为原始且最具可操作性的生命智慧经典。人们甚至在人生的不同际遇之中随便可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富有生命智慧的阐述，所有这些无不对身陷各种际遇的人以深刻的启发和正确的指导，最起码能够使人在各种际遇中免遭挫折和失败。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曾有这样的感慨：“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①这就是《易经》能够使人正确的一个有力证据。人们总是错误地理解了这句话，以为这是孔子四十余岁时对自己未来的一种打算和展望，以为天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才可以无大过，这是因为他们深信圣人是不会犯错误的，更无大过的。其实孔子这句话应该是其晚年的追悔之词，是经历了多年周游列国的四处碰壁之后的顿然醒悟，是对自己五六十年乃至终其一生追求和生活的一次深刻检讨，是说如果光阴能够倒回去，让他从五十岁起就能够像现在一样对《易经》有高度认识，乃至爱不释手，韦编三绝，终其一生就不会犯大过。关于孔子晚而好《易》的说法，应该是有一定说服力的。《论语·子路》载：“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承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从这段文字记载来看，孔子不仅引用恒卦九三爻辞，而且明确主张通过学习《易经》来提升自身修养，而不是用来占卜的。另外据帛书《要》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亦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汉书·儒林传》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帛书《要》记孔子与子贡力辩他好《易》“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还说：“故《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甚至还说：“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心，此谓《易》道。”但是这并不证明孔子不会占卜。大概在所有生命智慧经典之中，唯独《易经》有此妙用。这并不是鼓励人们每逢事情必须占卜，事实上只要真正深谙盛极必亏、物极必反的易理，是不占而知凶吉祸福的。

^① 程树德：《论语集释》，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本书所引《论语》均见于此书。

至于《坛经》，真正抛开佛教的宗教外衣，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所蕴涵的丰富而深邃的生命智慧。包括《坛经》在内的佛教经典所追求的其实是对生命大智慧的大觉大悟，如“禅”，铃木大拙说：“是见性的方法，并指出我们挣脱桎梏走向自由的道路”^①如“成佛”，用印顺法师的话说，“就是体悟真理，实现自由”^②；至于“般若”，《坛经》等佛教经典本身就阐释为智慧，只是这种智慧不是一般意义的智慧。一般意义的智慧，可能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特长或德性”，即使在更高意义上也只能是亚里士多德所谓“本性上最为高尚的科学和理性”^③。其实所有这些智慧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小聪明、小智慧，是建立在二元分别之心和烦琐知识经验基础上的所谓“准确”判断和“正确”取舍，如亚里士多德所谓“明智在于深思熟虑，判断善恶以及生活中的一切应选择或该避免的东西”^④。而禅宗的这个智慧实质上是建立在无善无恶、无是无非，乃至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不二论基础上的生命大智慧，即所谓般若智慧，所谓真如本性。达摩这样解释道：“不处无明为大智慧。”^⑤这也就是老子所谓明白四达的“袭明”^⑥。其实真正最高层次的智慧是《心经》之所谓“无智亦无得”^⑦，是《华严经》之所谓“得无所得”^⑧。事实上无论哪一种智慧，都是有价值的。《增一阿含经》有云：“唯智慧成就为第一义”，只是这一智慧如莲池大师所说“非聪明才辩之谓”，而是“见自本心”的“上上智”^⑨。即使作为聪明才智之智慧，最起码也有基督教《箴言》所说的价值：“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

① 铃木大拙：《禅与生活》，刘大悲、孟祥森译，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3页。

② 印顺：《佛法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③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④ 亚里士多德：《论善与恶》，《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第460页。

⑤ 达摩：《悟性论》，明尧、明洁编校：《禅宗六代祖师传灯法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⑥ 《道德经》第二十七章，本书概述部分所引《道德经》见于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⑦ 《心经》，河北禅学研究所编：《禅宗七经》，第1页。

⑧ 《华严经》卷二十九，《华严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

⑨ 莲池大师：《竹窗随笔》卷一，《净宗祖莲池大师净土集》下，苏州报国寺弘化社印行本。

学问。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①至少比无知要进步得多,如柏拉图认为“无知是一种恶”^②。只是几乎所有宗教,无论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将至高无上的智慧,以及自身获得智慧的希望寄托于上帝或真主之类的神灵,如《古兰经》有所谓:“真主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他以智慧赋予他所意欲的人;谁禀赋智慧,谁确已获得许多福利”^③;《传道书》亦云:“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聚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④唯独佛教将智慧归于人自身的本性,将超越乃至涅槃的希望寄托于人类自身。达摩有云:“佛从心出,心能生佛。”(达摩《悟性论》)禅宗认为人人本性中都存在智慧,甚至这个未经后天影响的本性,即是无二之性,也即是佛性,是般若智慧。《坛经》自序品有云:“无二之性即是佛性。”^⑤唯其如此,不是佛度化众生,而是众生自度,不是佛解脱众生,而是众生自我解脱。《维摩诘所说经》^⑥有云:“若自有缚,能解彼缚,无有是处。若自无缚,能解彼缚,斯有是处。”(《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这也就是《坛经》所强调的“自性自度”。所谓“自性自度”,其实就是“众生各各自度”,就是“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烦恼来菩提度”(《坛经·忏悔品》),也就是只要谁明心见性,就能成就智慧人生。这与《国际歌》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几乎同出一辙。至于宣鉴禅师所谓“这里无佛无祖。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⑦(《五灯会元》卷七)之类的说法更是通过呵佛骂祖极端破除了偶像崇拜。其实至少在原始佛教时代,佛陀仍然是人间的圣者,而非上天的神灵,如《增阿含经》等见品有云:“诸佛世尊,皆出人

① 《旧约全书·箴言》第16章第21—22节,中国基督教协会:《新旧约全书》,1994年版。

② 柏拉图:《斐莱布篇》,《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

③ 《古兰经》第二章,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④ 《旧约全书·传道书》第2章第26节。

⑤ 《坛经》,河北禅学研究所:《禅宗七经》,第329页。

⑥ 《维摩诘所说经》,河北禅学研究所:《禅宗七经》。

⑦ 普济:《五灯会元》,苏渊雷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

间,非由天而得也。”也许印顺法师的阐述,更有利于人们理解佛教的精神实质。他这样阐述道:“释尊是人,不是天上的上帝,也没有冒充上帝的儿子与使者,向人类说教。所以佛法是人间觉者的教化,也不像神教者假托经典——《吠陀》、《新旧约》、《可兰经》等为神的启示。这‘佛出人间’的论题,含有无神论的情调。”^①任何哲学都可能有着几乎相同的生命智慧,但佛教尤其禅宗比其他宗教哲学明显更具无神论色彩,更强调人类自身的本性乃至智慧,这显然有利于提高人们的自信心,有利于引导人们走出现代文明所导致的焦虑而证得生命大智慧,赢得生命的自由解放。

如果说《易经》、《道德经》和《坛经》三部经典有着共同的生命精神,这个精神就是对最高生命智慧的追求与张扬。最高生命智慧往往不是一般意义的技艺。一般意义的技艺虽然也可能蕴涵一定的生命智慧,如庄子寓言和宗白华美学都有这方面的阐述,宗白华认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②但技艺毕竟是技艺,不过是在单一选择基础上依赖长期训练乃至熟能生巧而形成的对单一活计的特别熟练而已,往往存在以偏概全,乃至挂一漏万的缺憾,而且越是熟练,存在这种缺憾的可能性越大。最高生命智慧也并不是知识。知识虽然视野更开阔,挂一漏万的缺憾有所改变,但毕竟仍然存在一定选择性,仍然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仍然有所分别和取舍。只要有所分别和取舍,就必定有所漏失;只要有所漏失,就只能有所知而有所不知,而不可能是一种无漏智慧。克里希那穆提亦云:“知识永远是不完善的,而由知识产生的一切思想都是有局限的、部分的、绝不是自由的。”^③真正的最高智慧常常建立在不二论基础上,既不分别,也不取舍,当然也无所漏失,所以常常是无所知而无所不知的。这种无所分别、无所取舍,乃至心无高下、得无所得的生命智慧,才是真正的最高生命智慧。这种智慧显然超越了巧拙、善恶、美丑等二元分别,超越了挂一漏万、知之甚少的技艺层次和有所分别与取舍、有所知而有所不知的知

① 印顺:《佛法概论》,第5页。

②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

③ 克里希那穆提:《生命之书—365天克里希那穆提禅修》,陶稀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页。

识层次,而进入了无知而无所不知的更高境界。也许人们并没有关注这种智慧,但正是这种智慧才真正是豁达自如、无所不知的。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所谓“无知”的慨叹,其实也正从不同侧面体现了这种智慧。如僧肇所云:“夫有所知,则有所不知。以圣心无知,故无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①

尽管在任何时代,最高层次的生命智慧都是不能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知解力选择适宜自己的经典进行阅读。正如西方人没有选择苏格拉底而选择了耶稣,中国没有选择老子而选择了孔子,中国民间佛教徒没有选择禅宗而更多选择了净土宗一样。这主要是受到普通大众的接受能力的限制,也许柏拉图的说法更能够帮助人们理解这一现象,这就是“普通心灵的眼睛难以持久地凝视神圣的东西”。^② 其实许多生命智慧经典对这种现象本身都有阐述。如《道德经》第四十一章即有:“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坛经》也有所谓:“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坛经·般若品》)尽管较之《道德经》和《坛经》,《论语》似乎更加通俗易懂,其生命智慧也相对有限,但孔子亦有“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的感慨。这也确实显露出读者的接受水平是存在一定差异的。

尽管阅读生命智慧经典存在很大困难,但其意义是不可忽视的,是任何形式和层次的类似西方式现代教育所无法比拟的。西方式学科专业课程教育往往以传授所谓学科概念乃至知识谱系作为主要目的,充其量只能培养所谓专家。这些专家无论有多么高的文化程度,只能是囿于学科专业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成为只拥有最为专业的学科知识的“野蛮人”,而不是一个和谐发展的完整的人。阅读生命智慧经典,作为永恒课程的最为重要的价值是可以避免西方式知识教育可能导致的单向度化,而造就真正具有自身生命智慧的和谐完整的人。因为诸如《易经》、《道德经》和《坛经》等

^① 僧肇:《肇论·般若无知论第三》,张春波校释:《肇论校释》,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8页。

^② 柏拉图:《智者篇》,《柏拉图全集》第3卷,第59页。

儒家、道家和佛教经典,确实是数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中华民族最高生命智慧的结晶,是千古哲人总结自身人生经验而得出的最高智慧,是帮助人们破除执著二元论乃至有所知有所不知的知识迷信,获得既不执著于二元论,也不执著于不二论,乃至无知而无所不知的生命大智慧,成就智慧人生之最为关键的方法与途径。基督教也十分强调智慧的价值与意义,“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①所以尽管人们对阅读中国生命智慧经典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意见,有些甚至明确反对,但阅读生命智慧经典确实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精神享受,都是人们成就智慧人生乃至幸福人生的关键。

二、学习中国生命智慧经典的方法

国学经典一般存在于经、史、子、集四大类之中,但各自所蕴涵的生命智慧却并不完全相同。一般来说,经、子类经典所蕴涵的生命智慧最为集中且高超,史类经典次之,集类经典更次之。经、子类多属哲学,史类多属历史,而集类则更多属文学。可见,经史子集的周遍会通至为重要。在当前所设立的中文、历史、哲学三大专业之中,似乎中文最为狭隘,先秦文学基本上涉及文史哲三大学科门类,属于大文学,至两汉仅对《史记》等历史典籍仍有所关注,对哲学却视而不见了,充其量只能是属中性文学,至魏晋南北朝文学则基本上萎缩为对集,乃至文学典籍的关注,对哲学、历史典籍则全然抛弃,这实际上已经完全堕落为风花雪月之类的极其狭隘的纯文学了。作为中文专业却不能涵盖国学四大门类,这的确是中文专业的悲哀,是国学的不幸。历史专业有些也开设古代汉语或训诂学之类,同时也涉及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等,确实显示了博大的襟怀与视野,但历史专业并不重视原典阅读,甚至对文学、哲学乃至历史典籍都不甚了了,这确实是舍本逐末之举。哲学专业虽然涉及原典阅读,甚至也基本上能囊括蕴涵一定哲学思想的哲学、历史乃至文学典籍,这自然是最为理想的了,但一般却很少对古代汉语乃至训诂学、文字学感兴趣,这又使其原典阅读如同釜底抽薪,最终丧失了应有的气度与魄力,沦为空洞哲学思想的自怨自艾了。

^① 《旧约全书·箴言》第3章第35节。

人们往往强调专业知识结构的建构,以为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结构,似乎就具备了一定的专业能力,实际上狭隘的专业知识结构也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一个人终生的知识视野乃至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知识结构越是狭隘,人们的视野乃至判断越是容易陷入狭隘与偏执,越是容易助长孤陋寡闻乃至孤芳自赏的缺陷。以至于当今社会许多所谓专家,其实不过是对极其狭隘的尤其其他人并不十分清楚的知识细节有所建树而已。无论这种专家其建树有多高,也不过是一个知识结构残缺不全,甚至可能是人格结构残缺不全的人。这种人充其量只是现代社会拥有许多知识细节的“野蛮人”。遗憾的是现代教育尤其大学教育却总是通过各种方式不遗余力地强化着知识细节的传授与积累,以及对“野蛮人”的培养,越来越多地制造着具有专业知识却没有文化修养的“野蛮人”:“他们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有关世界和人类的基本思想体系一无所知。这样的普通人是属于没有文化修养的新生的野蛮人,是落后于时代文明的迟钝者;而且既原始又落后,与他们自身存在的既现代又冷酷的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这种新生的野蛮人毕竟都是专业人员,要比以前的人更有知识、可同时又是更没有文化修养,如工程师、内科医生、律师、科学家等。”^①至于完整人格的培养,乃至生命智慧的证悟,更是被冲淡了。

人们熟知培根所谓“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的名言,却往往忽略了他接下来的论述,即“‘学问变化气质’。不仅如此,精神上的缺陷都有适当的学问来补救的,就如同肉体上的各种病患都有适当的运动来治疗似的”^②的观点。实际上,不同的学问能够补救气质乃至精神方面的诸多缺憾,而且多种学问的融会贯通更能促进和谐人格的发展。如哲学深邃而玄虚,史学严谨而刻板,文学空灵而浅薄。要兼备哲学的深邃、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空灵,并且避免哲学的玄虚、史学的刻板、文学的浅薄,最好是文史哲融会贯通,用文学的空灵克服史学的刻板,用史学的严谨克服哲学的玄虚,用

① 奥尔特加·加瑟特:《大学的使命》,徐小洲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7页。

② 培根:《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0页。